

回忆三十年代的北京图书馆

袁 涌 进*

(一) 沿革

北京图书馆是我国的国家图书馆。它的历史悠久，规模宏大，是藏书丰富的文化宝库，也是世界闻名的公共图书馆之一。北京图书馆的前身是京师图书馆。它是清政府废止科举制度后，于一九〇九年（清宣统元年）开始筹建的。

馆址初设于地安门外鼓楼西什刹海广化寺内。由于初创，开始只限于收藏图书，不对外开放，供读者阅览。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八月二十七日才开馆，对外公开阅览。开馆阅览至今已有七十周年的历史了。

广化寺虽然是明代名刹，但地面低湿，房屋破旧，地处偏僻，交通不便，对于保存书籍和读者阅览都很不利。自一九一三年十月至一九一五年六月间曾经停止阅览，听候迁移。

一九一五年七月迁移到安定门内方家胡同的清国子监南学官舍旧址。一九一七年一月二十六日在方家胡同新址举行开幕式，重新开馆，对外阅览。一九二八年，京师图书馆改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一九二九年一月由方家胡同迁至中南海居仁堂。同年八月合并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设立的北平北海图书馆。两馆在名义上已经合并，但仍在两处工作、藏书和阅览。同时选定北海公园的西侧清代御马圈的旧址（占地四十亩）兴建新馆，建筑面积是八千平方米。一九三一年夏新馆落成，两馆才集中于一处。这便是北京图书馆今天的馆址。

(二) 组织

一九二九年八月两馆合并以后，并组成了国立北平图书馆董事会，经费则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供给。馆长由我国著名民主革命家、教育家、科学家蔡元培先生担任，袁同礼任副馆长，代行馆务。

根据图书馆的工作程序和收藏的特点，分为：（一）采访部，下分为中文采访组、西文采访组和国际交换组；（二）编纂部（后改为编目部），下分为中文编目组、西文编目组和索引组；（三）阅览部，下分为阅览组、庋藏组和参考组；（四）期刊部，下分为中文期刊组和西文期刊组；（五）善本部，下分为考订组和写经组；（六）舆图部，不分组；（七）金石部，不分组；（八）总务部，下分文书组、会计组和庶务组。当时工作人员约有一百二十余人。中文编目组、西文编目组、阅览室、庋藏组的工作人员较多，约在十余人左右；其他各部组人员，一般只有二、三人或四、五人。部设有部主任一人，组设有组长一人。下有馆员、助理员、书记（即录士）、练习生和工友。

此外另设有购书委员会和编纂委员会各若干人。购书委员是聘请馆外学者、教授、专家担任，请他们向馆里推荐所需要的书刊。采访部部长以及各组长亦均参加购书委员会。编纂委员相当于研究员或研究馆员的职称。编纂部部长以及组长亦均兼任编纂委员。

（三）采访工作

馆藏来源是通过缴送、采购、交换、征集和受赠五种方式。当时政府规定全国各书局新出版的书刊，必须免费缴送一部到馆。图书馆向书局购买新出版的书刊，享受八折的优待。除全面入藏本国出版的书刊外，还积极地、有重点地入藏国外书刊。在中文图书方面，特别重视采访善本、珍本和地方志书。在西文图书方面，则注重采购自然科学（如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以及综合性的工程技术）、目录学、图书馆学、参考用书、考古学和有关西方论述中国方面的书籍。

采访工作，是藏书建设的开始。它是图书馆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一个图书馆藏书的质量好坏，是与图书采访工作人员是分不开的。采访部部长聘请我国著名版本、目录学家徐鸿宝先生担任。在三十年代里，他采购到很多名贵的善本。后来赵万里对版本学有所成就，是向徐鸿宝学习和徐鸿宝对他的培养是分不开的。在采购西文书刊时，特别重视购书委员所推荐的书刊。读者所介绍的书刊，亦在选购之中。

为了节约藏书所占面积，一般书刊，以采购一部为原则，个别的书刊，才有复本。图书到馆以后，经过加盖藏章和登录（卡片和书本）手续，分别移送到中文编目组和西文编目组。

当时虽然展开国际交换工作，因财力和人力的不足，仅仅与欧美少数著名的图书馆和学术机关进行书刊交换工作。

（四）编纂工作及其它有关问题

编目工作是图书馆的基础，也是上承采访下接阅览的中心环节。编纂部（后改编目部）部主任聘请我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刘国钧先生担任。他不仅有高深的图书馆学理论，并精通中西目录学，同时他又有丰富的图书馆工作的实践经验。他不崇洋，更不盲

目的抄袭。他在吸取西方图书馆的技术和方法的同时，又注意到我国传统目录学与中国图书馆实际情况相结合。这种精神始终贯串在他编撰的《中国图书分类法》、《中文图书编目条例草案》以及其它图书馆学论著之中。这对于改进图书馆管理方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他为北京图书馆以及全国各图书馆培养了很多有用的人才。对北京图书馆的建设以及发展我国图书馆事业做出了有益的贡献。刘国钧先生是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当之无愧的奠基人之一。

刘国钧先生对于初到馆的编目人员，先加以培训，热心讲授，经过实习阶段以后，才使其从事工作。经常审阅已编目的稿片，如遇有错误之处，立即指出，如此能帮助编目人员提高业务水平。

凡是初来馆的工作人员，大都在中文编目组或西文编目组工作一段时期，如此，使他们能够了解上承采访下接阅览的基础工作的过程和方法。例如初到馆工作的王重民和赵万里都在中文编目组工作过一个时期。以后，王重民先生担任编纂兼索引组组长，赵万里先生任采访部中文采访组组长，后调善本部考订组组长。

中文新书（即平装和精装书）和日文图书采用他于一九二九年所编的《中国图书分类法》（南京金陵大学图书馆出版）来分类。该法是自创一种体系以统一中文新书旧籍的分类方法，也是当时盛行于国内图书馆的图书分类法之一。它是以庸俗进化论作为基本理论的。大类共计有九个大类：000总部；100哲学部；200宗教部；300自然科学部；400应用科学部；500社会科学部；600—700历史与地理部；800语言与文学部；900艺术部。它的子目关于中国固有的类目，大都采自《汉书》艺文志、《通志》艺文略。《文献通考》经籍典、《国史经籍志》、《书目答问》、《四库全书总目》。关于科学，很多采自《美国国会图书馆分类法》，其次是杜

威的《十进分类法》。所用的符号是纯数字制,采用层累的原则,但是每类不拘泥于十分,而且同等序的数字亦不必用以表同等序的类目。特别是在史地部和语文部文学类里,类号编得很简短。无论是分类体系和号码编制,都和杜威的《十进分类法》毫无共同之处。这个分类法,在分类号码编制上有一定的长处,同时它系统清楚,富有助记性,在实际工作使用中最为方便。

新书的书次号码采用万国鼎编的著者号码表,该表是按照汉字笔排列法(见《新桥字典》)横(一)、竖(丨)、点(、)、撇(ノ)排列,用三位阿拉伯数字编制而成。常见的姓给有十个号码,不常见的姓给一个号码,稀见的姓几个字共同使用一个号码。

为了更好分类旧籍(即线装书),刘国钧先生根据我国传统分类次序编制了《普通图书分类表》,共有十五个大类:1.目录门(目);2.经籍门(经);3.历史门(史);4.地志门(地);5.传记门(传);6.古器物门(古);7.哲学门(哲);8.宗教门(宗);9.社会科学门(社);10.自然科学门(科);11.应用科学门(应);12.语言文字门(字);13.文学门(文)14.艺术门(艺);15.总记门(总)。类目的符号是采用汉字和阿拉伯数字混合编制而成的。

旧籍的书次号码,按照我国目录传统,以著者的时代(即用《普通图书分类表》的中国时代表的号码)排列为主,再依著者姓氏来区分。姓氏系用首末二笔相加而成。点(、)是1,横(一)是2,竖(丨)是3,撇(ノ)是4,捺(ㄣ)是5。日文图书书次号码用著者的姓名三个字,亦采用首末二笔相加而成。

例如:清张宗法撰的《三农记》分类号是应301;书次号码是847。84是表示张宗法是清乾隆年间人,7是“张”字首末二笔相加而成的。

西文图书依照西方的习惯,是以著者款

目作为主要款目。当我国图书馆开始采用以卡片著录中文图书的时候,大都是仿照西文图书著录的方法,也以著者款目作为主要款目。当时惟有刘国钧先生否定了这种著录办法,主张并提倡我国目录的传统方法,以书名款目作为主要款目。为了北京图书馆和全国各图书馆著录好中文图书起见,于一九二九年撰有《中文图书编目条例草案》(载于《图书馆学季刊》第三卷第四期)。日文图书亦用《中文图书编目条例草案》来著录。

图书经过登录后,便要进行分类和编目。图书分类就是根据图书的内容,确定每一本书放在所采用的分类法体系中的适当位置,把同类的图书聚集在一起。编目就是根据编目条例来编制图书馆目录,将我馆所藏图书从不同的角度揭示出来,以供读者查阅。

中文新书、旧籍和日文图书对于读者均各备有分类目录、书名目录和著者目录。对于工作用的,均各备有排架目录。书名目录片和著者目录片均各按照笔划多寡来排列。笔划相同,再以点(、)、横(一)、竖(丨)、撇(ノ)先后次序来区分。分类目录和排架目录均按照所采用的分类法体系来排列。新书除参考书外,均可借出馆外,当时称为“出借书目”。日文图书亦可借出馆外。旧籍只能在馆内阅览,当时称为“普通书目”。为了便利排列卡片起见,于一九三六年编印有《国立北平图书馆中文目录检字表》一册。

中、日图书基本上能做到随到随编,同时在三十年代里还将京师图书馆的旧藏改编完毕。

除编制卡片目录外,还编有书本目录。一九三三年编印有:《梁氏饮冰室藏书目录》四册、《国立北平图书馆方志目录》四册;一九三四年编印有:《国立北平图书馆书目目录类》二册、《博野蒋氏寄存书目》四卷一册;一九三六年编印有:《国立北平图

书馆方志目录二编》一册。

一九三六年一月中文编目组同人基于图书馆事业发展和需要,为了协助各图书馆编目工作,节省编目力量,解决缮写卡片的困难,开始向国内国外发行排印卡片目录,所印卡片,以本馆入藏新到图书为主,此外对非馆藏新书以及出版虽久但有重要价值图书(限于一九一一年以后)均酌量编印卡片,以应需要。卡片著录内容,大体根据刘国钧所撰的《中文图书编目条例草案》。每书只印主要卡(一称单元卡)一种,以书名为主。详注该书的书名、著者、版本、册数(一册则注出面数)、图表、附注、分类号以及排印卡片号码等等。卡片著录内容力求详尽,如一书有不同书名或简略书名等均详为注出。翻译书籍,尽量注出原书名、原著者姓名,对于西洋著者除有华名自署外采用统一译名,以期适合编制各种目录,供业务上之参考。在附注项之下,用阿拉伯数字注出的则系本片的主题款目;用罗马数字注出的则系本片的书名副款目、著者款目(包括注释者、译者、编辑者等)。卡片的分类号,印于右下方近孔处,系根据刘国钧编的《中国图书分类法》一九三六年再版增订本,以供各馆使用或参考。卡片右下角印有本片的排印号码,以便度藏和选购。短横前号码系印刷年份,短横后号码系排印次序。在排印号码之后的一二号码,则系表明系第二次重印。今举主要卡如下图:

例一:中国绘画史

中國繪畫史

潘天壽撰 民國二十五年 上海商務印書館
鉛印本 大叢本第一版
[七]+二五〇面 又冠圖 二三公分 精裝 二元二角

附錄:城外繪畫流入中土考證:第233—250面
大學叢書(原上海美術專門學校叢書)

1. 繪畫—中國—歷史 2. 潘天壽撰

國立北平圖書館編印 944.09 25—5852

例二:新工具

新工具

英國培根 Bacon, Francis, 1561—1626 撰 沈因明譯
二十世紀社編輯 民國二十三年(1934) 上海辛銀
書店 鉛印本

三+三二三面 又冠圖(肖像) 二二公分 平裝 一元二角

哲學叢書甲種
本書原名: Novum organum.
Bacon 原譯倍根
原著係拉丁文據英日文譯本譯

1. 科學方法 2. 培根 Bacon, Francis, 1561—1626 (英) 撰 3.
沈因明譯 12. 二十世紀社編輯

國立北平圖書館編印 144.32 25—1437—2

例三:春秋明志錄

春秋明志錄 十二卷

明戴通撰 民國二十四年 上海商務印書館
影印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一〇册 二〇公分 線裝

四庫全書珍本初集經部春秋類
教育部中央圖書館籌備處委託商務印書館影印

1. 春秋—注疏—明 2. 中國—歷史—春秋 (770—404 B. C.)
3. 戴通 (明) 撰

國立北平圖書館編印 083
621.7526 25—4520

例四:汉书地理志稽疑

漢書地理志稽疑 六卷

清全祖望撰

(在四明叢書第一集 民國二十一年 四明
張氏約園 刻本 第五十二至五十三冊)

1. 漢書—地理志—考訂 2. 中國—地理—漢 3. 全祖望
(清) 撰

國立北平圖書館編印 086.23200
662.1 25—4821

以书名为主要卡片,上端留有地位,以备订购的图书馆填写著者、注释者、译者、编辑者或主题;左上角留有地位,以备填写索书号码。排印卡片,既可成套订购,亦可根据需要的来选购。凡已订购有一张的图书馆,即可作为工作用的排架卡片。凡编有主题目录而不编分类目录的图书馆,可按A公式(即用阿拉伯数字所表示的主题款目和用罗马数

字所表示的书名副款目和著者款目的数目)加一张(为书名目录卡片之用)来购买。凡编有分类目录而不编主题目录的图书馆则按B公式(即用罗马数字所表示的书名副款目和著者款目的数目)加二张(为书名目录卡片和分类目录卡片之用)来购买。由于购用排印卡片目录,可以做到大量避免编目上的重复劳动。因之,国内外图书馆订购和选购者颇多。每年印五千种,每种卡片印五百张,售完之后,根据需要再行重印。其中编印有著名丛书及其子目卡片,如《四部丛刊》(重印初编、续编和三编)、《四部备要》、《四库珍本初集》、《选印宛委别藏》、《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第一集》、《安徽丛书》(第一至五期)、《四明丛书》(第一至四集)等等,最受欢迎。自排印卡片发行之后,不久立即获得美国罗氏基金会的赞赏,并供给全部排印卡片经费,包括编目人员的工资和贮存卡片柜的设备费在内。此外编印有《国立北平图书馆排印卡片目录》五册,既可供作零购排印卡片之用,同时亦可作为分类和编目的参考工具书。一九三九年九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始行停止。

西文图书分类和编目方法,刘国钧先生则主张仍沿用前北平北海图书馆所采用的方法。

西文图书北海图书馆已采用《美国国会图书馆分类法》,它是根据实际藏书而编制的。由于有相当充足的文献保证,在图书馆实践中起了一定的实践效用。在欧美图书馆界认为它是一部实用分类法。该法因立类较多,易于适应分科图书馆的调节。同时也便于集中。它还不断在继续修订。美国国会图书馆发行的印刷目录卡片上载有该馆的分类号码,采用它的印刷目录卡片,则无需自编。如此可做到大量节约人力,只要做一些加工就行了。

西文书次号码,通用《克特著者号码表》,因其适用于西文姓氏。有二位和三位数

字两种。小馆用二位,大馆用三位。北海图书馆已采用了三位表。

西文图书著录方法,北海图书馆已采用了《美国图书馆协会编目规则》,美国国会图书馆亦根据这种规则著录印刷卡片。以后成为美、英图书馆协会联合修订的《英美图书编目规则》,已于一九六六年完成,于一九六七月出版“北美本”;一九六八年出版英国本。

标题,北海图书馆已采用《美国国会图书馆标题表》。该表曾于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六年两次增订。这是该馆主题目录的标题。在很多主题后面注有相应类号,对于已知主题而不知类号的人可资参考。

西文编目组订有美国国会图书馆发行的印刷目录卡片校样,即可按卡片号码向该馆购买卡片,亦可以仿照校样来复制。此外还能供作西文采访组为选购图书的参考。由于使用《美国国会图书馆分类法》和利用印刷目录卡片,可以节省了大量的分类和编目工作的力量。因而基本上做到了西文图书随到随编,很少积压。

自四十年代美国国会图书馆开始把它的印刷目录卡片汇印成书本目录,五十年代印齐了它的著者目录和主题目录两大套以后,又于一九五七年开始印行《全国联合目录》,这不限于馆藏,也包括全国各大图书馆送交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目录卡片在内。一九六一年又开始试验“目录卡片随书发行”。这对于采用《美国国会图书馆分类法》的图书馆更为方便。

西文图书对读者用的目录,是将著者、书名和主题目录卡片混合排成为“字典式目录”。这样可以节省导片和减少一些目录卡片。凡主题目录卡片与著者和书名目录卡片相同的,则可以省去。没有编制分类卡片目录。

西文编目组于一九三一年编印有《北平各图书馆所藏西文图书联合目录》四册,又

《北平各图书馆所藏西文期刊联合目录》一册。此外还编印有《国立北平图书馆馆藏西文参考书目录》一册以及其它目录等等。

中、日、西文图书经过分类、编目和图书加工完毕后，经过组长审阅和部主任复查，然后开单送交阅览部度藏组点收。度藏组则按分类法的系统来排架，以便于图书取还。每周并在出纳柜目录室和大阅览室向读者公布新编图书目录单，以便于读者阅读。

索引组的工作，主要是根据期刊上所登载的论著按专题来编制索引，详注论著的篇名登载于某种期刊某卷某期某页，以便于使用者一索即得。

一九二九年编印有《国学论文索引》（初编），这是对检阅和研究中国文化、古籍、史学、语言文字、文学、艺术论著的有用的工具书，博得了国内学者的赞赏。一九三一年及其以后编印有续编、三编、四编和五编。

一九三二年编印有《文学论文索引》（初编），一九三五年编印有续编。

一九三七编印有《铁路工程论文索引》，这由我馆在南京设立的工程参考图书印行。

此外于一九三五年编印有《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这是根据清代文集的篇名而编制的索引。

编纂委员会的编纂，主要是从事于学术研究。编辑《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和《图书季刊》（中英文合璧本）。馆刊侧重于阐述有关我国目录学的论著。《图书季刊》则是向国内外介绍和评论我国新出的图书。

由馆里出版的专著，主要有下例几种：《清开国史料考》六卷附补二册（一九三一年）、《晚明史籍考》二十卷附通检一卷十册（一九三三年）、《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六卷〔附《大连图书馆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不分卷〕一册（一九三二年）、《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十二卷一

册（一九三三年）、《书画书录解题》十二卷附著者索引六册（一九三二年）。

此外还编有《丛书子目汇编》，稿本已交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在对日抗战战争中而遭到了遗失。

（五）阅览工作

阅览工作主要是包括藏书组织和保管、图书流通（阅览和外借）以及参考咨询等几个环节。无论是藏书工作，还是读者工作都是图书馆业务工作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刘国钧先生兼任阅览部部长时，他的工作室设在阅览部靠近出纳柜目录室，亲自站在前哨阵地，并领导阅览部全体工作人员做好为读者服务的工作。他在阅览规章制度方面为我们今天的北京图书馆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他主张开夜馆，星期日和节假日不闭馆，照常阅览。实践证明来馆阅览的读者，要比平时较多。这由于学生平时要学习，教师平时要教书和备课，研究人员平时要进行科学研究工作，工作人员平时要上班工作。只有星期日和节假日便于他们来馆阅览和查找他们所需要的图书和资料。在三十年代里做到了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开馆。

度藏组是负责藏书组织和保管图书的。自收到中、西文编目组已编好的书以后，即按照所采用的分类法体系来排架。也就是根据索书号码来组织藏书。中、西文编目组对于一种书有不同的版本，要加以区别。一部书有两册和两册以上的，要注明册次号码；一部有复本的，自第二部起也要注出部次号码。在图书馆里每一部书、每一册书都不容许有相同的号码，以便更好的组织藏书，否则就容易形成混乱。无论是排架或是归架图书，必须要正确无误，否则便要海底捞针了。

度藏组工作人员要根据读者的所填写索书单来取书。图书不在书架上或取不到书

时,要说明理由,如已经借出、有人阅览、因公提用或是正在修补装订等等。借出馆外的图书则用代书板插在书架上,代书板要写明索书号码、书名和册数。取出图书后要立即送到阅览组出纳柜或直接送到读者的座位上。

对于因流通阅览或借出馆外而损坏的图书,一经发现,立即送到装订室修补,流通量较大的平装书则要改为精装。凡遇有索书号码不清楚,或是书标已掉落的图书,则送到中、西文编目组去重新加工。

开馆阅览的时间,每天早八点半钟到晚九点半钟。开辟的阅览室,计有大阅览室、期刊阅览室、新闻阅览室、善本阅览室、四库阅览室和舆图阅览室共六个。各阅览室共有座位三百五、六十个。每天接待读者数百人次。为了便利读者进行科学和学术研究,特设有专门研究室二个。每个研究室备有四套桌椅和四个书架,可以容八人从事科学和学术研究工作。由于善本阅览室、四库阅览室和舆图阅览室的读者人数不多,每天自上午八点半钟到下午五点半钟止。

阅览善本和四库的读者,必须由机关的介绍和申请,经过馆方的批准,方能入室阅览。当时在善本和四库阅览室的读者,大多数是为了传抄善本和四库全书而来的。

由于研究室少,座位有限,同样也要由机关介绍和申请,经馆方批准,才能使用。在研究室的读者,所借阅的图书,如未阅毕,可以存放在研究室的书架上,不限于当日归还。

凡成年人而衣冠整齐,先在衣帽柜领取阅览证,即可入馆。新闻阅览室陈列着本市当天和外地最近期的报纸在阅报台。如果要借阅过期的报纸,要填写索书单向管理人员凭证借阅。期刊阅览室在期刊架上陈列最近的中、日、西文期刊。当年过期的期刊亦要填写索书单凭证向管理人员借阅。过年的期刊而已经合订装成册的和图书都要向出纳柜

填写索书单凭证在大阅览室里借阅。还清图书,即退还阅览证。读者来馆阅览的方法,就是凭证阅览,凭证离馆。

凡是读者经过机关的担保和一定的手续,发给借书证,读者得借阅中文新书、日文图书和西文图书五种,期限是两个星期,如未阅完,可以再续借一次。

读者可以在本馆的食堂用膳。有些外地来馆的读者而从事研究工作的,经过机关介绍,可以住宿在本馆单身人的宿舍里,宿舍在本馆的附近北海公园东门陟山门大街。

图书馆的参考咨询工作是图书馆为科学研究服务的一项工作,也是为读者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参考组经常向读者进行参考辅导工作,还对读者用书面、电话、口头解答咨询的各种问题。

一九三六年编印有《中文参考书举要》一册,这本书列举了我国重要的参考书,以供读者参考和使用。同年又编印有《北平各图书馆所藏中国算学联合目录》一册,这本联合目录是提供我国著名数学史家李俨撰写《中国算学史》之用的。为提供某机关研究中国边务问题,曾编有《中国边务图籍录》稿本二册,当时南京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传钞珍藏,后来将稿本送交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六) 期刊工作

期刊亦称杂志,每期版式基本相同的连续刊行的出版物。它的内容围绕某些学科或某一研究对象而由许多文章编辑而成的。它的出版刊期短、速度快,内容新颖,及时反映最新知识和最新研究成果,对于科学研究工作和学术探讨方面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它是图书馆收藏重点部分之一。

期刊还包括报纸(也称新闻纸)在内。我馆每天、每周、每月要收到大量的报刊,根据工作的需要,设立有专门的部组来从事这一繁重的工作。期刊部部长由副馆长袁同礼兼任。

报刊到馆后,必需立即用卡片来记到,表示某一报刊是否按期收到没有。报刊记到后,期刊还要在封面上加盖藏章,然后放在期刊阅览室期刊架上,并将过期的期刊取回。报纸要放在新闻阅览室的阅报台上,而换下过期的报纸。

报纸记到卡片,每月用一张卡片;期刊记到卡片,每年用一张卡片。很多图书馆期刊记到卡片都分为周刊、旬刊、半月刊、月刊、双月刊、季刊等六种格式,而中、西期刊组则采用一种期刊记到卡片替代六种记到卡片。这种方法,既经济而又方便。

期刊每年或每卷出齐后,便由期刊组整理,送出装订成册,由中、西文采访组登录后,再经中、西文编目组分类、编目和加工,最后送交皮藏组收藏。至于报纸则按薄厚的具体情况,按月、季、半年或一年装订成册。按报纸的名称排列在期刊部的报库里。

中文期刊组曾于一九三六年编印有《国立北平图书馆馆藏中文期刊目录》一册。

(七) 善本工作

北京图书馆的前身——京师图书馆,它继承了七百年前南宋皇家图书馆——缉熙殿、五百年前明代皇家图书馆——文渊阁的部分藏书。又以清朝内阁大库、翰林院及国子监南学为基础,陆续收到《永乐大典》、文津阁《四库全书》、敦煌石室写经以及其它古代珍贵刻本和手写本。这些都是祖国文化遗产的宝库。

在三十年代里,当时已藏有善本书十余万册。包括有:五世纪至十九世纪的抄本书,十世纪至十九世纪的刻本书,还有活字本、套印本、名人抄校本等等。善本部部主任由徐鸿宝先生兼任。他对于版本的鉴别和考订尤为独到。他还领导了考订和写经两组工作人员做好善本工作。

考订组对修补破旧的古书,要求“整旧如旧”,保存它的原样。名贵的善本书用楠

木书匣内衬樟木夹板来存贮,如此可以防潮防虫。其次则采用四合布书套,四面合拢,可以防止灰尘侵入。皮藏于玻璃门钢铁书柜里。至于文津阁《四库全书》则仍用原书架和原书匣贮存。

善本书库中书籍一律均按照善本登录号码来排架,它的优点,同一批善本书籍可以放在一起,不仅可以节约空间,同时还以避免倒架。对于读者编制有善本书目卡片,大体上是根据刘国钧所撰的《中文图书编目条例草案》来著录的。书名和著者目录排列法与中文目录卡片同。分类目录则按照“四库法”来分类的。

一九三三年编刊有《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四卷四册(刻本);一九三五年编印有《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乙编》四卷一册(铅印本)。一九三七年编辑有《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第一集》七十册,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

为了更好的保管善本书籍和四库全书,由考订组的工作人员来负责阅览工作。在提供阅览时,必须先把书检查一下,如有特殊情况,须记在索书单上,作为回收书时检查的依据。

京师图书馆收藏有敦煌写经八千余卷,其中以佛经居多,如公元五世纪初的写本《律藏初分》是我国现存佛经古写本中很珍贵的一卷。当时还藏有满、蒙、藏等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图书一万数千册,也是以佛经居多,其中以藏文明刻本《七佛如来本愿经》以及清乾隆、嘉庆间德格版和奈塘版《大藏经》最为名贵。因此,均由写经组整理和保管。在写经组的工作人员,对于佛经颇有研究,有的工作人员还通晓满、蒙、藏的语言文字。

一九三七年撰印《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一册。化费很多年月校刊和整理了《五体清文鑑》,民族出版社出版的《五体清文鑑》就是我馆所提供的。

至于西文善本书，则由西文编目组分类、编目和加工，在分类号码上的中间冠有“V”字者，送交度藏组另行珍藏。

（八）舆图工作

舆图也就是地图。它显示地表面的自然和社会现象的图。概括地反映它们的地理分布，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关系。按内容可分为普通地图和专门地图。地图与字典、百科全书等都是图书馆里不可缺少的重要参考书。

在三十年代里，我馆已藏有中外舆图一万余幅，设有专部，负责舆图的工作。编纂王庸先生兼任舆图部部长。王庸先生是我国地理、舆图专家。由他来主持舆图部部长，可谓因材施教。

法国铁路工程师普意雅，他在我国铁路工作数十年，一生嗜好从事收集中外地图和地理书籍，收藏颇为丰富。他在北京逝世以后，由其夫人（华人）将其遗藏，全部赠送给我馆。普意雅的遗藏更加充实和丰富了我馆舆图的专藏。

舆图阅览室是为读者提供阅览舆图的场所。它还在舆图阅览室的靠墙三面，备有书架，陈列着中外重要的地理书籍和有关舆图的著作，开架阅览，这样更给与读者莫大的便利。为了便利读者研究中国地学，一九三四年编印有《中国地学论文索引》（正编）二册；一九三六年编印有《中国地学论文索引续编》二册。

（九）金石工作

中国考古学的前身是金石学。它研究对象主要是古代铜器和石刻。到了晚清，甲骨、简牍、印章、封泥、瓦当等大量出土，因而扩大更加丰富了金石学的内容。

在三十年代，我馆藏有河南安阳出土的殷墟甲骨三千多片，西汉的竹简以及汉熹平石经和魏三体经的残石。因此需要设立金石

部来整理和从事研究这一工作。编纂刘节先生兼任金石部部长。他是我国金石专家。也是因材施教。

一九三四年编印《石刻题跋索引》。此外还编有《国立北平图书馆藏碑目墓志类》稿本，后来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十）其他

注意培养业务人才：当时人们对于图书馆学这一门科学，很不重视，无论是在图书馆学专科学校的学员，或是在大学里选读图书馆学系的学生，为数稀少。全国各图书馆受过图书馆学专业培训的工作人员，则更是寥若晨星。馆方鼓励没有学习过专业的工作人员到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去学习。保送到文华学习一年的有二人，学习二年的有三人。对于已经学习过图书馆学专业的工作人员，而有志于深造者，则保送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去学习图书馆学，先后共计有五人。

开展国际协作：为了搞好对于国际图书馆之间的协作，我馆曾先后派于道泉、王重民到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工作；派向达到英国大英博物院图书馆工作；派吴光清、王重民、刘修业到美国国会图书馆工作。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德国柏林普鲁士国立图书馆亦曾派来馆员到我馆工作。

馆外设有办事处：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以后，我国宣布对日抗战。我馆大多数工作人员，留守在北平。副馆长袁同礼率领少数工作人员先在长沙设立办事处，后迁移到昆明和重庆两地。办事处的主要任务，是对国内外做联系工作，同时亦便于征集和采购内地和解放区出版的书刊。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后，昆明和重庆两地办事处回到北平。

此外，在上海亦设有办事处，保管我馆存在上海的善本书。解放后将贮存在上海的善本书运回北京而将办事处撤消。

（十一）结束语

三十年代的北京图书馆藏书丰富，环境幽美，开馆时间长，借阅又便利，是当时读者一个自学的好场所。但因它脱离广大人民群众，每天来馆的读者为数不多，虽然其中有些刻苦自学的读者（包括工作人员在内），有的成为学者、教授、专家和作家，但是为数不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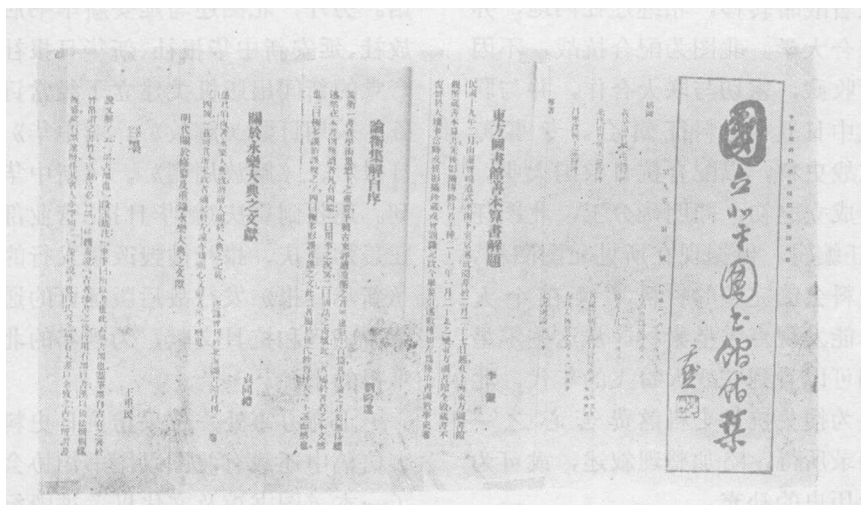
今天，北京图书馆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和关怀之下，以崭新的面貌出现

在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行列之中，而获得巨大的发展。北京图书馆是个文化事业机构，是个学术单位，是个社会大学。它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为学术研究服务。

我写这篇回忆，亦是我馆史料的一部分。值此开馆七十周年，敬作献礼。

一九八二年五月

• 本文作者为原北图副研究员。



三十年代《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书影）